

解决就业不妨借鉴他国先进经验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在地区和人群上正逐步扩大,同时明年将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整体看,明年的就业形势将十分严峻。”12月23日,在由全国政协举办的“中国首届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于法鸣表示,针对当前局势,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一份针对就业促进的系统政策正在起草之中,“将对就业问题解决作出统一部署。”(12月24日人民网)

面对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各国政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仅仅当作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当作关系到政权能否稳定的大事来抓。有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可以缓解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解决中国就业问题,首先要找到就业难的原因。对这个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窃以为,受发展体制和政府规划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不够发达、自主创业不够充分,从而影响了就业结构的转型,又影响了就业容量扩充,是形成我国就业难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失业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它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在国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否认或遮掩本国的失业现象。笔者认为,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做法对我们有着

深远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的这份“就业政策蓝本”的制定,更显得弥足珍贵。

其一是加强技术培训和就业咨询指导。许多国家把技术培训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其二是鼓励失业人员自谋职业。鼓励失业人员自谋职业,是各国政府为谋求解决就业问题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思路;其三是开辟就业新领域。开辟就业新领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各国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思路;其四是发放生活补贴。发放生活补贴是建立在积极、主动寻找工作基础上的;其五是制订优惠经济政策。通过调整福利政策,减少企业赋税,

调整失业补助政策来鼓励企业发展,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和人们就业的积极性。同时,还采取特殊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在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服务等方面给中小企业以支持。

这次人保部对就业促进的系统政策正在起草之中,不妨考虑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既要考虑长期解决的办法,又不能忽视当前所应采取的应急措施,要长期与短期并重,标本兼治,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解决失业与再就业问题的路子。借鉴国际社会解决失业与再就业问题的经验教训,虽然这些国家的国情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一些做法对我们也不无借鉴之处。黄云香

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间还缺链接

自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手腕上那疑似“江诗丹顿”首开先河之后,先后有十几位官员身陷“名表门”。由于这些名表的价值远在官员以正常的薪金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因此这些官员实则面临“财产来源不明”的质疑。在理论上,不排除这些名表是合法所得,那么,相关官员能做的,而且应做的,就是自证清白。

对于这件事,多数官员坚持“沉默是金”,周久耕局长从事发之后就不在局里,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委书记杨光远则是“喊冤”。在这三种方式中比较,无疑杨光远的辩解是最为可取的。有回应总比没回应好,某些官员惯有的不予理睬的傲慢人们已经见惯不怪;辩解也总比打击报复好,那是典型的公权私用。

杨光远称自己是被网友误会了,他举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其佩戴的手表并非价值52万元的劳力士名表,而只是一只价值2000多元的梅花牌手表,还是他用攒钱买的。当然,目前人们还无从判断网友与杨光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孰对孰错,但这种“自证清白”的姿态和行为首先应得到认可,在当前还应得到鼓励。杨光远虽然也说过“已委托专人为自己开始维权”这样的话,在杨并没有开始或不当的行为之前,我们也应该对这样的维权姿态作无罪的推定。

假如杨光远的“名表”真是梅花牌,在法律上杨光远确实有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通知相关网站涉嫌侵权的信息进行删除,还可以要求已经构

成名誉侵权的网站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澄清等,甚至诉诸法律。网民虽有对官员保持“合理怀疑”的权利,但在官员已经有确凿证据反证怀疑的事项不成立时,也应及时停止怀疑,避免对守法的官员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问题恰恰在于,为何目前只有一名官员站出来向公众说出自己手腕上的“名表”不过是只“山寨版”,其余多数官员保持沉默,反而增添了民众的合理怀疑。网络监督或公民监督到了这一步,理应有关反腐机构介入调查,并在调查结束后及时给公众一个真相。早在两年前,最高检察机关就曾发文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关注住新闻媒体曝光的问题,深挖案件线索,加大查办力度。那么,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大约也是必要的。

但事实上,反腐从来不是一件“依申请”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件“依职权”进行的国家行为。带奢侈名表、抽高价名烟的官员有可能涉嫌受贿,或者涉嫌用赃款购买房产。对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调查,“收到举报”从来就不是一个必备的选项。从媒体报道中发现线索,从案件调查中发现线索,已经成为“腐败发现机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反腐败上,检察、纪检等反腐机构要增强主动意识。

网络舆情汹涌,昭示着民众并不缺乏反腐的热情。对于公权力机关来说,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尊重民意表达,并更好地吸纳和整合民间智慧来推进反腐向纵深发展,已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民人

别让“娱乐”的调查报告迷了眼

人们常说,“打是亲,骂是爱”,然而暴力升级却使原本甜蜜的爱情变得令人窒息。日前,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中心王向贤博士对天津市1035名大学生抽样调查发现,暴力比例高且持续发生。超过半数大学生在恋爱一年间曾发生心理暴力,近1/3会发生肢体暴力。严重暴力的发生率超过10%,有近10%的大学生会因恋爱暴力中身体受伤,性强迫也达到3%以上。(《城市快报》12月24日)

1/3大学生情侣有恋爱暴力,应重视恋爱观——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我着实吓了一跳。三成的大学生有恋爱暴力,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情,但转念一想,怎么可能呢?仔细看了看报道,不禁哑然一笑。原来如此“三成大学生情侣有恋爱暴力”的调查结论,才不过调查了天津市的千余名大学生。调查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我们不得而知,但以一个地方千把人的“调查”得出一个涵盖整体的报告结论并通过媒体发布,以偏概全难免会误导民众。



12月20日,在陕西咸阳一个党校研究生班的考场,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对重申考场纪律的考务负责人破口大骂:“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致使该考场考试时间延迟十多分钟。之后,面对记者,王局长再次发飙:“是谁向你们报社投诉的?我对投诉人有知情权!”(12月22日《西安晚报》) 文/图 春鸣

对官员遭人肉搜索有必要另定规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2日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草案对网络侵权作出了规范。提起网络侵权,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莫过于最近宣判的“人肉搜索侵权第一案”。2007年12月,北京白领姜某跳楼自杀。其博客称,丈夫王菲的婚外情令其痛不欲生。网民对王菲发起“人肉搜索”。法院判定,大旗网与“北飞的候鸟”创办人张乐奕侵权成立,赔偿王菲精神损失并在网站公开道歉,而天涯网因在合理期限及时删除了相关内容,被判免责。此次侵权责任法草案似乎是对法院判决的直接肯定,明确了网站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向网络

服务提供者发出要求删除、屏蔽侵权内容的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得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在网络侵权和“人肉搜索”侵权的案件中,许多网站可谓“助纣为虐”,无论在2006年的“铜须”事件、“虐猫”事件,2007年的“辱师”事件还是韩国的崔真实事件中,网站对于侵权言论传播、扩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明确网站的侵权责任对于净化网络环境和避免对公民名誉侵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于普通公民来说,网站明知或者在提出要求后不删除侵权言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不足以警戒网站避免侵权行为。

不过,我们的网络上不仅有对于普通公民的批评,更有很多对于官员的批评。最近就有二起:一起是网民曝光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抽“天价烟”,戴10万元一只的名表“江诗丹顿”;另一起是网民指责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委书记杨光远佩戴一款52万元的“劳力士”名表。

《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作为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官员,其对于公众的批评、检举,理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如果官员和普通公民同样适用同等规则,当他们提出要删除网站言论时,网站必须删除,否则要承担责任,这种做法的潜台词就是取消网民的舆论监督。如此,也就

不会有近日南京市江宁区纪委调查周久耕一事了。

因此,侵权责任法草案有必要对于网络对官员的侵权适用另外的规则:对于侮辱官员的言论,网站当然有责任及时删除;对于涉及官员隐私的行为,则要区分这种隐私是否与公共利益有关;对于所谓诽谤官员的言论,如果网民有根据,即使官员提出删除,网站也无须及时删除责任——除非官员出示权威结论,但网站应当将官员澄清声明同时刊登;此外,在官员指控网站侵权时,也应当引入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的“实际恶意”原则——若不能举证证明对其职务行为进行批评的人是出于实际恶意(即明知或不或对不顾事实与否的轻率心理状态),便不能得到损害赔偿。 杨涛

大学生就业难 政府该怎么办

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北航视察的时候,李未校长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将1/4甚至1/3暂时难以就业的研究生先留下来,让他们在实验室里做一段时间的助理,既可以继续学习、研究,增强未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又可以充实科研力量。这个建议得到了肯定。

对于这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如能进一步借鉴美国的博士后,日本的学术振兴会研究员的思路,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毕业生——科研助理机制,将是一条

能短期缓解就业压力,又能长期培养人才的战略举措。

“北航办法”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启示:大学应该和政府更加紧密地配合,主动解决就业问题。政府还可以出台更全面系统的政策,引导、帮助大学生到人才严重短缺的西部基层去。仅以“热门”的法学专业为例,全国现在有600多个法学院系,每年大量毕业生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导致看起来热门的法学专业,就业率却十分糟糕。可整个西部都严重缺乏法律人才。

同样,大学生“村官”制度也是一个良好平台。推进新农村建设,全国上百万行政村,需要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类似这个思路,大型装备制造、能源产业、计算机软件业等等,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大量人才作为储备,如果能在这些领域新招一定数量的员工,对缓解全社会的就业问题应该能起到一定作用,哪怕暂时把三个人的饭分给五个人吃。总之,和市场相比,国家应立足长远,决不能让人才轻易流失、荒废。 任羽中

范跑跑上岗 有别于问题官员复出

有报道称,因在汶川地震中扔下学生独自逃生引发网民愤怒,并被戏称为“范跑跑”的原北大毕业生范美忠,将正式受聘于北京某教育学校。据悉,范美忠还将在北京某大学礼堂公开演讲人文关怀及如何考上北大。

今天,范美忠再就业了。在经济形势不景气,失业和面临失业的人数逐渐增多的当前,范美忠应该是幸运的。毫无疑问,这是社会给他的一个机会,是对虽有不当行为和过激言论,但终究是个年轻人的范美忠的一种宽容。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是我们常说的“恕”。尽管范美忠的言行曾经一度受到全社会几乎是一边倒的谴责,现在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大家对问题有了更理性的看法,还是愿意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这一点,希望范美忠能够珍视,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受聘理解为公众是最容易健忘的,或者以为那样的自己在这样的社会还是有机的可乘的,等等。道路在自己脚下,往后走对走错还是重回旧路,就看范美忠如何选择了。

与范美忠的复出“相映成趣”的,是一些问题官员的复出。前不久传出,4年前因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涉案被问责官员,如今多数重获要职。而今年8月,被“双开”消失后的邱晓华在一篇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掌控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建议》中以“原国家统计局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重新现身。此外,通过各种形式复出的问题官员还有许多。如果说社会对范美忠的“再就业”容易“宽恕”的话,那么,如何对待这些悄然复出的问题官员就不那么简单了。毕竟,“范跑跑”再就业与“问题官员”复出是两码事。

客观地说,并非所有的问题官员都不能复出。根据干部任用条例,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现在的关键是这个“重新任用或提拔”在程序上还缺乏制度化的规定。类似阜阳劣质奶粉中的问责官员,他们是什么“复出”的?怎么复出的?还不够公开,人们对此毫不知情。不公开就意味着没有接受必要的监督;不接受监督,就可能产生用人的腐败,可能为新的事故埋下祸根。

我们可以用欣慰的眼光看范美忠的再就业,但一定要用警觉的眼光看问题官员的复出。如果说范美忠的过激言行挑起的是社会争论,那么,问题官员的复出则激刺一方百姓的福祉。孰轻孰重,不言自明;该恕则恕,该严则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王文琦



12月22日晚,四平市区一辆出租车与一辆逆行的丰田轿车相撞。浑身酒气的丰田轿车司机下车后反倒打伤的士司机,还自称是四平市纪检委的。在急诊室,民警想按住他的胳膊让医生抽血化验,他硬是挣脱说:“不抽血,一抽血,就往外掏工作证。”一位交警气愤地说:“据看过他工作证的民警说,他确是纪委的。”

纪检工作关乎党风民心,其从业者手中握有巨大权力。四平市纪委这位工作人员,不断地把证件往外掏,目的就是为了让警察摁住……近年来屡有反腐的纪检官员涉腐,更值得我们反思、警惕。 文/图 小强

“天塌”未必“砸”大家

俗话说“天塌砸大家”。但这句俗语现在却不那么灵验了!

这不,22日来自津报网的“利好消息”披露说,离2009年1月1日燃油税征收已经开始倒计时,近10万原养路费稽征人员的安置已有初步着落。北京、交通运输部,一个专门的安置小组负责人说“现在的大局是保持稳定,保就业,他们都会得到妥善的安置。”简单地讲,这类“准下岗人员”,凡编制内人员“将主要在交通系统内部消化”;而学历较高,年龄较小的,内部消化不完的,可以分流到税务部门。

这真是有惊无险!眼看着“铁饭碗”要丢了,不曾想却因“祸”得“福”即将捧上“钢饭碗”。对于一般性兼并破产企业的工人而言,此刻做好下岗、买断工龄,自谋职业的决定是唯一的选择。而这10万大军是何等幸运,何等幸福啊!

不仅如此,这则新闻还有“号外”:从“准下岗”到摇身一变成为税务局的公务员,好是好,但当公务员那是逢进必考啊!据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淘汰率高达98.7%。何以解忧?一位接近交通运输部安置小组的知情人士透露,这种“担心实属多余”,这批人员进入税务部门是单独考试,远没有普通的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真是妙哉妙哉!

更应反思“山寨文化”何以会流行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指出,“山寨文化”毕竟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内涵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如果我们对“山寨”过于宽容,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难生长了。(《人民日报》12月24日)

葛剑雄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和长者,但葛教授的观点——“山寨文化”的存在不利于创新文化发展,实话实说,我并不那么看。

首先要厘清的是,“山寨手机”与“山寨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商标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沦丧下,打法律和监管“擦边球”的商业产物;而后者,则不以牟利为目的,纯粹是为了表现公民个体或团体的表现

欲望和参与精神,并不违法。故而,两者虽都有“山寨”之名,其实形似而“神”迥异。

葛教授说,以前在图书市场上出现的“全庸著”、“古龙新著”,放在今天也可以叫“山寨版”文化。其实不然,“古龙新著”是对于商品的“山寨”,的确是在打擦边球,说到底与“山寨手机”可归于同一范畴,与“山寨文化”不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山寨文化”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模仿,像各地网民自发组织的不同版本的“山寨百家讲坛”,借鉴的不过是“百家讲坛”的名头,而内涵却有着自身的文化特色,不能称之为“一种以模仿为核心内涵的现象”。我以为,“山寨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价值多元语境下的一种独特表达,究其本质来说,“山寨文化”其实正是一种处

更应反思“山寨文化”何以会流行

于初级阶段的朴素的创新文化。

当下,我们更应该反思“山寨文化”何以会流行。换言之,同样是参与和表达,为什么非要以“山寨”的形式而不是“正统”的形式?显而易见,还是资源的稀缺和机会的匮乏。如今的春晚以央视春晚“一家独大”,不“山寨”又能怎样?草根民众如果也想走上传播平台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山寨”行吗?所以,我要跟葛教授说,不是没有人来搞创新,民间也不是没有创新文化,而是缺乏表现的载体。

正如北大教授夏学奎所言,当民间的需求表达渠道不够通畅,当少数人把持、垄断民意出口时,当草根的思想、意见不能得到主流认可,自己就必然要选择一些渠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舟